

宋代河北兵馬大元帥府初探：以武力重建為中心

梁偉基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問題的提出

日本學者寺地遵認為，「南宋政治史與北宋末期政治狀況間，是具有連帶關係的」。¹然而，他忽略了兩宋之際河北兵馬大元帥府（以下簡稱元帥府）在南宋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中所產生的影響。宋人周輝在《清波雜志》中指出：「高宗繇康邸使虜廷，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²足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是趙構（宋高宗，1127–1162在位）三個最重要的經歷之一。

南宋繼承了北宋不少的政治特質，這是肯定的，但在南宋建立過程中，它將要面對與北宋截然不同的政治格局和軍事形勢，必定要吸收一些新的政治養分，貯足力量去應付國家面臨的挑戰。劉子健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南宋儘管是中興，可是它的政治另有它的特色，和北宋不同。」他並以「包容政治」的概念解釋趙構為甚麼要將各種政治力量兼收並蓄。³日本學者平田茂樹提出了「開封體系」和「杭州體系」兩個概念去說明兩宋的差異，他認為北宋是以「對」的系統為政治運作中心，南宋則是以「御筆」的系統為政治運作中心，兩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轉變，是由於南宋專權的宰相頻出、首都的政治空間分散化所致。⁴兩位學者清楚說明南宋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受到當時的形勢所左右，從而形成一些與北宋截然不同的政治特色。

¹ 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新莊：稻鄉出版社，1995年），頁17。

² 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一〈潛邸瑞應〉，頁1。

³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載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23。

⁴ 平田茂樹：〈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之新可能性——與國家史、國制史研究的嘗試性對話〉，《宋史研究通訊》2009年第1期，頁60–61。

美國學者 Charles Tilly 指出：「國家創造了戰爭，戰爭也創造了國家。」⁵ 可以說，宋金兩國的戰爭創造了元帥府這個軍政機構，進而創造了南宋政權。有論者認為「高宗立國於江南，圖存之機惟在軍力之重建」，⁶ 筆者認為趙構開府相州，圖存之機亦惟在軍力之重建；也有論者認為「軍事力量的重建自是南宋政權的重要政治課題」，⁷ 筆者認為軍事力量的重建同樣是元帥府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考驗著趙構及其元帥府幕府的政治能力。

就筆者所見，近代學者沒有給予元帥府足夠的重視。有關元帥府的研究，只有臺灣李安所著的一篇短文，而且缺少分析，只簡單地羅列一些史事而已；而且從其副題看來，文章主旨只是宣揚岳飛之勇猛善戰及趙構之無能怯懦，例如文中指「康王以兵馬大元帥握有以上兵力，然始終未與金人力戰，逍遙自全，祇副元帥宗澤在開州、德州境，得岳飛之衝鋒，屢挫敵軍」。⁸ 近年則有陳瑞青〈宋代河北兵馬大元帥府探微〉一文，開始注意到元帥府的重要性，可惜欠缺研究深度。⁹ 至於討論元帥府武力的著作同樣不多，例如朱瑞熙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林瑞翰的〈宋代兵制初探〉、石文濟的〈南宋中興四鎮〉、張峻榮的《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¹⁰ 甚至討論南宋兵制以完備見稱的小岩井弘光的《宋代兵制史の研究》，都沒有注意到元帥府重建武力的歷程，就直接以南宋為討論開端。¹¹ 本文擬重建元帥府建立武力的歷程，並分析其結構和特質，嘗試為這段歷史做些補白，最後指出元帥府的建立對我們研究宋高宗初年的武力重建帶來甚麼樣的啟迪。

⁵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 Blackwell, 1990), p. 67.

⁶ 王世宗：《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9年），頁161。

⁷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29。

⁸ 李安：〈宋高宗初在相州（安陽）出任兵馬大元帥始末——岳飛當年從軍報國的時代背景〉，《中原文獻》第9卷第12期（1977年12月），頁17–18。

⁹ 陳瑞青：〈宋代河北兵馬大元帥府探微〉，《滄桑》2010年第4期，頁106–7、129。

¹⁰ 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56；林瑞翰：〈宋代兵制初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12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年2月），頁132；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博士論文，1974年），頁74–81；張峻榮：《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65–70；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7–28。按：《宋朝兵制初探》2011年出版了增訂本，但沒有增加討論元帥府武力的篇幅。

¹¹ 小岩井弘光：《宋代兵制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有學者指出，本書糾正了以往學者討論宋代兵制時詳北宋略南宋的缺失，並補充了就糧禁軍、壯城軍、牢城軍、南宋屯駐大軍等課題。參見曾瑞龍、趙雨樂：〈唐宋軍政變革史研究述評〉，載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179。但是，本書並沒有注意到元帥府對南宋軍事力量重建的影響。

二、國史上的軍政機構

就筆者綜合所得，國史上的軍政機構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二種類型是政權出現政治危機時，往往會產生一些軍政合一、臨時與戰時的軍政機構，領導政權可資調動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繼續與外敵或叛亂者抗爭。

第一種類型是政權因外敵入侵或內部叛亂而陷入危機，從而衍生一些軍政機構，藉此延續政治傳統和統領軍事力量，與入侵者或叛亂者繼續抗爭。這種類型的模式為：外敵入侵 / 內部叛亂 → 政權出現危機 → 軍政機構誕生 → 舊政權瀕臨瓦解 → 舊政權得以延續 → 軍政機構取消。這類型軍政機構具有繼承特質，一方面是舊政權的延續，另一方面是舊政權重建前的雛形，這就是國人常稱的「中興」。「中興」固然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以下是這種類型軍政機構的例子：

(一) 唐朝中葉，安史之變爆發，玄宗(712-756在位)從長安逃至四川，下詔以太子李亨(肅宗，756-761在位)為天下兵馬元帥，統率軍隊繼續與叛軍抗爭。後來，李亨即位於靈武。¹²

(二) 南宋末年，元軍南侵，文天祥設立由大臣統領的勤王軍幕府，抵抗元軍。後來，元軍攻陷臨安府，恭宗(1275-1276在位)出降，南宋滅亡。¹³

第二種類型是政權因外敵入侵、內部叛亂或者權臣擅政而陷入危機，並產生了新興的政治勢力，從而衍生一些軍政機構，藉此為新政權的建立做準備。這類型的模式為：外敵入侵 / 內部叛亂 / 權臣擅政 → 新興政治勢力產生 → 軍政機構誕生 → 舊政權徹底瓦解 → 新興政權建立 → 軍政機構取消。這類型軍政機構帶有強烈的破舊立新特質，是新興政權的雛形。以下是這類型軍政機構的例子：

(一) 東漢末年，曹操挾持獻帝(189-220在位)以號令天下，軍政要務皆受制於曹操設立的「霸府」。「霸府」成為國家權力核心，亦即曹魏政權的前身。¹⁴

(二) 唐朝末年，汴州節度使朱溫(太祖，907-912在位)權傾朝野，擔任天下兵馬元帥，牢牢掌握軍政大權。後來，朱溫篡唐自立，改國號梁。

(三) 元朝末年，天下大亂，羣雄並起，朱元璋(明太祖，1368-1398在位)建立明朝前，在各地成立翼元帥府作為管治機構，形成了翼元帥府體制。¹⁵

¹² 關於唐室在安史之亂以後成立元帥府的情況，參見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69-96。

¹³ 有關文天祥領導的勤王幕府，參見周國平：〈文天祥勤王幕府述論〉，《河北學刊》2003年第1期，頁166-69。

¹⁴ 有關曹操設立的「霸府」，參見柳春新：〈曹操霸府述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頁44-53；張軍：〈曹操霸府的制度淵源與軍事參謀機構考論：兼論漢末公府的「幕府化」過程〉，《石家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頁67-74；陶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¹⁵ 有關朱元璋設置的翼元帥府，參見阪倉篤秀：《明王朝中央統治機構の研究》(東京：汲古〔下轉頁62〕

第三種類型是非漢族政權例如遼朝、金朝、元朝等，出於軍事上的需要，成立了一些軍政機構。這種類型的軍政機構在成立之初，軍事味道濃厚，功能較為單一，就是要完成朝廷授予的軍事行動，例如遼朝的兵馬都元帥、金朝的都元帥、元朝的行樞密院。這種類型的模式為：軍事行動展開→軍政機構誕生→軍事行動結束→軍政機構取消/軍政機構轉型。以下是這類型軍政機構的例子：

(一) 遼朝末年，天祚帝(1101-1125在位)以六院司大王蕭幹里刺任兵馬都元帥、蕭查刺阿不任副元帥，率領七萬兵馬東征。¹⁶

(二) 金朝初年，太宗(1123-1135在位)以完顏杲領都元帥出兵北宋。¹⁷金人滅宋後，都元帥府從純粹處理軍務的軍政機構轉變成管理中原漢地的最高軍政機構。

(三) 元朝初年，為了應付與南宋的戰事，經常設立行樞密院，例如中統十年(1269)夏四月，世祖(1215-1294在位)以史天澤等行荊湖等路樞密院事，駐守襄陽；以劉整等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駐守正陽。¹⁸

遼朝皇帝還經常任命太子或皇太弟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代表皇帝統率全國軍事力量，例如太宗(927-947在位)即位前曾任天下兵馬大元帥。¹⁹遼朝中葉以後，領天下兵馬大元帥者往往兼任京都留守。

由此可見，非漢族政權除了臨時的軍政機構外，也設有常置的軍政機構，協助君主統率軍隊。

國史上的軍政機構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已如上述。兩宋之際成立的元帥府是政權遭受外來壓力而衍生的產物，並且成功延續舊政權統治，屬於上述軍政機構的第一種類型。

三、兩宋之際成立的軍政機構

北宋末葉，徽宗(1101-1125在位)君臣欲完成太宗(976-997在位)未竟之業，再次「經略幽燕」，²⁰戰略是聯合崛起於東北、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夾擊遼朝。²¹結果，北宋不

〔上接頁61〕

書院，2000年），頁5-37；青山治郎：〈朱吳國翼元帥府考〉，《駿台史學》第13期（1963年），頁91-117。

¹⁶ 脱脱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三十〈天祚帝紀四〉，頁357。

¹⁷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六〈完顏杲傳〉，頁1740。

¹⁸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八〈世祖紀五〉，頁149。

¹⁹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頁18。

²⁰ 陳樂素認為徽宗以前所謂的燕雲，或稱幽薊，或稱燕薊，或稱幽燕，甚至只簡單地稱燕，所以「燕雲」一詞，實為徽宗時代的產物。參見陳樂素：〈宋徽宗謀復燕雲之失敗〉，載陳樂素：《求是集》第一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6。曾瑞龍認為，「經略幽燕」比較通俗的字眼帶有較貼切的時代性。燕、雲並舉是北宋末葉的

〔下轉頁63〕

僅沒能收復幽燕，而且引來金兵兩次南侵，終致滅頂之災，開封淪陷，徽宗、欽宗（1126–1127在位）被金人俘虜北去。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云：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強為弱，以寡制眾，用是道也。²²

上述記載從民族、地理、經濟等因素解釋金人武力強盛的緣由，金人正是挾著這股銳不可當的軍事力量吞遼滅宋。

無論是民兵、鄉兵，還是駐守地方的正規軍，宋軍多非金兵對手。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以二千人與金軍十七騎對決，金騎「分為三，以七騎居前，各分五騎為左右翼而稍近後」。面對金人騎兵的戰陣，宋軍竟然「奔亂，死者幾半」。²³金人第二次南侵期間，軍隊如入無人之境，檀州、薊州、太原府及真定府等兩河重鎮先後淪陷，兩路金兵最終合圍開封。

〔上接頁62〕

用語，在宋初並不流行；『收復』二字也預設了燕雲屬於中原的領土，殊不知以契丹人的角度來看，宋人的行徑近乎侵略，而且宋初也始終沒有收復燕、雲」。參見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xxviii。

²¹ 宋太宗曾聯結契丹四周民族以圍堵遼朝，其中包括女真人。參見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16；廖隆盛：〈宋太宗的聯夷攻遼外交及其二次北伐〉，載廖隆盛：《國策、貿易、戰爭：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1–28。

²² 《金史》，卷四四〈兵志〉，頁991。金兵有精銳部隊稱為「鐵鷂子」者。據湯開建考證，「鐵鷂子」見於《遼史·百官志》，意指鐵騎，即裝甲騎兵。後來，西夏及金國的軍隊也設有「鐵鷂子」的軍種。參見湯開建：〈西夏「鐵鷂子」諸問題考釋〉，載湯開建：《党項西夏史探微》（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348–61。北宋末年，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何常指出，「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超遠，軾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此西人步騎之長也」。參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一百九十〈兵志四〉，頁4720–21。西夏「鐵鷂子」由党項豪族子弟親信所組成，有學者認為類似金人的「拐子馬」。參見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526。據鄧廣銘說，「拐子馬」是指「左右翼騎兵」。參見鄧廣銘：〈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載《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46–67。

²³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四年〔1878〕越東集印本，1962年），卷三六，頁八下。

金人大軍壓境，徽宗倉皇傳位皇太子趙桓，是為欽宗，自己卻帶著親信逃往南方。面對金兵圍城，欽宗想透過談判解決危機，遂派遣李稅等前往金營商討議和條件，其中一項是北宋要選派一位親王和一位宰相作為人質。當欽宗問諸王，哪位願承擔此重任時，康王趙構「越次而進，請行」。臨行前，宰相張邦昌「垂涕」，但趙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²⁴這種男子漢的氣概，與他後來為逃避金人而四處流徙的倉皇表現，可謂判若兩人。

然而，金人以趙構表現鎮定似非皇子而把他遣回。金人為甚麼會這樣做呢？據記載，趙構「使斡離不軍營，為虜帥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²⁵結果，金人將趙構遣回。史載趙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²⁶能夠「挽弓至一石五斗」。²⁷此外，前人也有指出，金人放還趙構，是因為他「語言不遜，金人不愛也，復令入城，至是以肅王行焉」。²⁸近人對此也有不同看法。王曾瑜認為由此可見趙構「天生神力」，²⁹張峻榮則認為這是前人刻意營造趙構的形象。³⁰由於史料不全，金人是否真的以為康王是將家子而放還，還是因為趙構在金營出語不遜，無從斷定。³¹

金人在欽宗願意割讓三鎮等條件下退兵，徽宗亦從南方返回開封，過著太上皇的生活。但是，宋人沒有履行割讓三鎮的承諾，而且組織軍隊增援太原，引致金兵第二次南侵，兵鋒再次直指開封。金兵再度圍城，欽宗只好派遣趙構以告和使的身

²⁴ 同上注，卷三十，頁二下至三上。

²⁵ 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1875–1908）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1909）印碧琳琅館叢書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下卷，頁一上。

²⁶ 李綱：《靖康傳信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二，頁13。

²⁷ 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委宛別藏》影宋鈔本，1967年），卷一，頁一上。

²⁸ 《會編》，卷三六，頁九下。

²⁹ 王曾瑜：《宋高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3。

³⁰ 張峻榮：《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頁11。

³¹ 有關趙構被金人遣回開封，《大金弔伐錄》收錄了〈宋主請歸康王書〉及〈斡離不送還康王回奏〉，可以參看。〈宋主請歸康王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為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寧。……敢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斡離不送還康王回奏〉則是肅王抵達金營後，金人準備放還康王的回函，其中有云：「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以壓驚，式表微意。」參見佚名（編）、金少英（校補）、李慶善（整理）：《大金弔伐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98、199。由此可見，是金人主動要求欽宗另遣親王到金營為人質的，但金人要求欽宗另遣親王的原因，卻始終沒有解釋。

份出使金營，同行者包括王雲、耿延禧、高世則、藍珪、康履、黎燾、楊公恕及韓公裔等人，大部份均為康邸僚屬。

趙構出使不久，金兵已推進至開封城下。同時，趙構一行從瀋州前往相州之際，金將宗翰派遣四百鐵騎邀截，但沒有成功。³²隨著局勢日趨惡化，欽宗在大臣的建議下，打破趙宋立國以來從不任命宗室為兵馬大元帥的傳統，派遣閤門祗候秦仔等八人分持親筆蠟書前往相州，授予趙構河北兵馬大元帥（以下簡稱大元帥），盡起河北一路軍馬進京勤王。³³

秦仔等抵達相州後，趙構命韓公裔「破蠟彈，得黃絹方四吋許，親筆細字：『知卿起義勤王，可除卿兵馬大元帥，陳邁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³⁴又准許他「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³⁵賦予趙構不少的權力。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一日，趙構開元帥府於相州，³⁶到建炎元年（1127）五月十日趙構即位於應天府後解散。

³² 《會編》，卷六四，頁一上。

³³ 欽宗的任命是「河北兵馬大元帥」還是「天下兵馬大元帥」，文獻有不同記載。《宋史·何臬傳》：「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臬建議請以為元帥，密草詔稿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同書《陳邁傳》：「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宋史全文》：「戊申，命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會編》：「是時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駐軍山東。」但是，《宋史·高宗紀》：「拜帝為河北兵馬大元帥，……詔帝盡發河北兵，命守臣自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辛丑，見王，辭以面受睿旨，盡起河北一路將兵入衛。……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見《宋史》，卷三五三〈何臬傳〉，頁11136；同書，卷四四七〈陳邁傳〉，頁13182；佚名（撰）、李之亮（校點）：《宋史全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卷十五，頁858；《會編》，卷八一，頁二下；《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頁440；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88年），卷一，頁18。王曾瑜認為當以《宋史》及《要錄》的記載為準，故本文採用了「河北兵馬大元帥」之說。參見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2、319。按：李心傳《要錄》（頁19）對此有詳細考訂。至於趙構所任乃河北兵馬大元帥，何以能夠越出河北一路，並吸收河北以外的軍事力量？趙構受命不久開封便淪陷，金兵隨即四處尋找其下落，局勢已急轉直下，難道趙構還逗留在河北，等待金兵追捕？難道趙構為了自保，還計較來歸的部隊是否河北的？筆者以為，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這是權宜之計。

³⁴ 《會編》，卷七十，頁十二下。

³⁵ 熊克（撰）、顧吉辰、郭羣一（點校）：《中興小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卷一，頁3。

³⁶ 關於趙構開元帥府的地點，宗澤主張在應天府，其理由有五：第一，「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第二，「道路居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第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第四，「於拱寧屯兵為嚴守計」；第五，「可斷北來餉道」。參見宗澤（撰）、樓昉（編）、王庭曾（重編）：《宗忠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卷一〈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頁八上。

開元帥府後，趙構委任了一批康邸僚屬及河北守臣擔任幕僚：黃潛善為徽猷閣待制、副元帥；耿延禧、高世則、董耘、趙子崧、顏岐為參議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起之、河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楊淵、³⁷河北西路提舉茶鹽公事秦伯祥為幹辦公事；康王府都監藍珪、康履、黎燾、楊公恕，內知客韓公裔並為主管機宜文字；³⁸滕康、周望並為康王府記室。趙構又接納耿南仲等人「軍行先藉糧食」的意見，委任一批財政官僚進入元帥府，包括以河北路都轉運使張愨、京東路轉運副使黃潛厚兼任隨軍應副，³⁹知信德府梁揚祖為隨軍轉運使，代知濟州李迨為隨軍輦運。⁴⁰

元帥府的正式成立及運作，成為趙宋皇室號召軍民抗敵的重要政治象徵。

四、趙構在河朔一帶的動向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趙構一行出城後，開封城「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並陳州門」。⁴¹金兵攻破開封後，徽宗、欽宗及大部份宗室、官僚大臣均成為金人的階下囚。

宗翰等決定廢立異姓後，即遣人四處搜尋趙構下落，防止他在外復辟宋室。當趙構等抵達相州後，百姓皆諫止其繼續前進，並指「肅王已不反，乞大王起兵拒敵，不宜北去」。趙構等抵達磁州後，不只宗澤勸他們不要北去，⁴²連父老百姓也勸阻，直指「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蕃兵」，⁴³而且以隨行的王雲將挾持趙構北去再加以殺害。知相州汪伯彥也以蠟書呈上趙構，指收到情報，金人「鐵騎約有五百餘人」，「執村人為鄉導」沿路搜尋其下落。於是，汪伯彥派劉浩領兵二千人護送趙構一行南下，並率領親兵一千元在安陽河迎接。⁴⁴

不少文獻都記載趙構逃避金人時的神怪傳說，例如題為陳東所撰的《靖炎兩朝見聞錄》，便有一則趙構如何得到神祇幫助逃避金人追擊的傳說：「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塔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

³⁷ 《要錄》卷一頁21作「王淵」，恐誤。

³⁸ 《會編》卷七一頁六下作「主管機密文字」。

³⁹ 《會編》卷七一頁六下作「直龍圖閣」。後來，張愨以延康殿學士出知大名府，遂以河北路轉運判官顧復本為隨軍應副，跟隨宗澤前往開德府，負責宗澤部隊的後勤補給工作。參見《會編》，卷七三，頁三下。又《會編》記載：「趙野元知大名府，為軍民所逐。朝廷遂以運使張愨直學士知大名府。元帥府用事者，耿氏父子、黃潛善、宗澤、汪伯彥等耳。」（卷九九，頁三下）

⁴⁰ 《宋史》，卷三七四〈李迨傳〉，頁11592。

⁴¹ 汪藻（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卷十二，頁1252。

⁴² 《要錄》，卷一，頁18。

⁴³ 《宋史全文》，卷十五，頁856。

⁴⁴ 《會編》，卷六四，頁九下至十下。

矣。』康王曰：『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⁴⁵在清人錢采、金豐的《說岳全傳》中，此幕情景成為「金營神鳥引真主，夾江泥馬渡康王」一節的內容。上述傳說當然不足取信，但反映出金人頗為忌憚趙構在北宋臣民間的號召力。

趙構在相州成立元帥府後，有使者向金人報告，指趙構「已占據河北之地」，以致金人擔心「河北州軍恃王不肯交割」。⁴⁶在開封城內的樞密院編修官胡理曾上書金人，指「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惠卹我都城，則河北慕義」。⁴⁷可見以趙構貴為大宋皇子的身份結合河北一帶宋人力量所形成的反撲勢力，對金人而言確實是不可低估的威脅。所以宗翰派遣三千軍馬陪同曹輔帶著詔書尋找趙構下落，命他立刻返回開封。⁴⁸

趙構得知消息後，決定從相州轉赴大名府。為吸引金兵注意，趙構命劉浩為先鋒，帶領兵馬前往濬州、滑州擔任疑兵，又命大名府帥司派遣兩路兵馬：一路前往舊魏縣，以防備新魏縣的金兵；一路前往內黃縣，以防備滑州的金兵。⁴⁹後來，趙構一行抵達元水鎮，即收到劉浩派來的騎兵報訊，指劉浩開抵濬州後，因大河還未結冰，遂命丁順率兵馬五百人乘舟渡河，但中軍還未渡河，就遇上來自胙城縣的金兵千餘人在滑州邀擊，軍馬被金兵衝斷，丁順「將殘兵東走」，劉浩率領中軍二千人自濬州沿河急進，趕往與趙構一行會合。⁵⁰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二記載：「王至村舍下馬，村人爇火為王溫酒，灸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許久，村人有來報，旁近有三虜騎，問之曰：『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已過數日矣。虜人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即上馬行。申刻，至北京。⁵¹幸好趙構接納耿南仲的建議，「擇十四日離相州」，否則就成為金人的囊中物。⁵²金人隨即遣軍包圍相州，並扣押汪伯彥在開封的兒子大理寺丞汪似及女婿都水監丞梁汝霖。

金人並沒有放棄追捕趙構，並向呂好問說：「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呂好問暗地裏遣人持書通知元帥府，勸告趙構率「所領之兵，度可當則邀擊之，不然

⁴⁵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頁三上至三下。關於泥馬渡康王的傳說，參見趙翼（撰）、樂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二十〈高宗泥馬渡江之訛〉，頁317-18；鄧小南：〈關於「泥馬渡康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6期，頁101-8。

⁴⁶ 《會編》，卷七三，頁二上。

⁴⁷ 《要錄》，卷一，頁29。

⁴⁸ 同上注，頁21。

⁴⁹ 《會編》，卷七二，頁七下。

⁵⁰ 同上注，頁九下。

⁵¹ 同上注，頁十上。

⁵² 同上注，卷七三，頁四下。

則宜遠避」，並指「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⁵³反映出當時政治中樞崩潰，政治權力陷於真空狀態。

為了保證趙構的安全，元帥府決定分拆部隊，抽調部份人馬出來，讓宗澤帶領二萬人屯駐開德府，以陳淬為統制兼中軍統領，劉浩為前軍統領、尚功緒為左軍統領、常景為右軍統領、王孝忠為後軍統領，⁵⁴河北路轉運判官顧復本為隨軍應副，負責駐軍的後勤補給工作，並向外發放趙構也藏身軍中的消息，⁵⁵企圖轉移金兵視線，讓趙構可以安全轉移他處。金人收到「情報」後派遣張徽前往開德府召回趙構，但「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⁵⁶宗澤並下令城內士兵放箭攻擊張徽等，⁵⁷金人又一次無功而還。至此，金人已經意識到趙構並不會輕易投降，遂多次出兵進攻元帥府據點，以鏟除這個心腹大患。

表一：金兵進攻元帥府據點（靖康二年正月至三月）

月份	過程	資料來源
正月	金兵進犯曹州，被黃潛善所部擊退。	《會編》78/2 上
	金兵進犯濮州，被京東路轉運判官閻邱陞所募的勤王軍擊退。	《會編》78/2 上
三月	宗澤評估金兵必進犯濮州，派遣權邦彥領軍備禦，成功將敵人擊退。	《要錄》3/70
	金兵先後進犯興仁府、開德府及濮州，分別被張換、孔彥舟及閻邱陞屬下的部隊擊退。	《會編》85/1 上
	金兵自宛丘逼近興仁府屯駐，並派兵進犯開德府，被宗澤派遣孔彥舟將其擊退。	《要錄》3/70
	金兵進犯濟州，推進至柏林鎮，距離濟州只有一百里，趙構命元帥府都統制楊惟忠「警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滿以待」；張俊則領所部為疑兵，混淆金兵視線。結果，金兵不敢貿然展開攻勢，「拔寨遁去」。	《要錄》3/70

說明：（一）本表所用資料包括《要錄》及《會編》；（二）資料來源例如《會編》78/2 上即表示資料出於《會編》卷七十八，頁二上。所用版本詳見本文注釋。

⁵³ 《要錄》，卷三，頁65。金人向呂好問說：「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是金人不把趙構放在眼內。在表面上來看，金人面對一個北宋大臣，當以勝利者的姿態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坦白說，如果金人要出動五千騎去追捕一個落難的皇子，未免大陣仗一點了，唯一的解釋是，在這種勝利者的狂妄下，透露出他們懼怕趙構的政治號召力，故不敢掉以輕心。

⁵⁴ 北宋末年，在第三次進援太原的援軍中，河北制置使解潛麾下將校名王孝忠者，未知是否為同一人。參見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卷五四〈奏議·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頁606。

⁵⁵ 《會編》，卷七三，頁六上；《宗忠簡集》，卷七〈遺事〉，頁十七下。

⁵⁶ 《會編》，卷七八，頁一上。

⁵⁷ 《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頁441。

上述一連串軍事行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打擊趙構，逼迫其屈服，另一方面是要為新成立的張邦昌政權掃蕩反對勢力。

元帥府面對金人強大的軍事壓力，亦曾主動出擊，例如宗澤率領部隊向開封推進，於南華縣與金兵爆發遭遇戰。結果，宗澤麾下的後軍統領王孝忠中箭陣亡，隸屬宗澤的知博州孫振亦為亂兵所殺。⁵⁸可見當時元帥府的軍力雖能抵擋金人進犯，但要主動出擊也不容易。

趙構出使金營後，便一直在河朔一帶活動，金人亦一直視其為最大的隱憂：從最初以較溫和的方式，多次派人將他召回開封，到後來採取多次軍事行動，企圖把他鏟除。

趙構及其幕僚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生存，要生存就要有武力，所以趙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重建軍事力量。

五、元帥府重建武力的歷程

趙構可以避過被金人俘虜，但為了應付來自金人的攻擊，元帥府需要加強軍事力量，以抵禦這股新興勢力的威脅，求得自身的生存，繼而為中興宋室作準備。

趙構與宗澤的書信透露，當初趙構奉詔出使金營，只帶同約一千名隨行人員，其中包括軍事人員，負責保護趙構安全。⁵⁹這從《清波雜誌》的記載可以得到證明：「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在旦夕。』」⁶⁰既見「裨將」，則可以確定趙構出使隊伍配備軍事人員。

趙構初至相州時，麾下一千人的編制沒有多大變化。⁶¹元帥府成立後擴充至一萬人左右，包括樞密院將官劉浩所招募的相州義士、信德府的勤王軍馬、大名府救援河東的軍馬及來自太原府、真定府及遼州的潰兵。⁶²據李若水所言，自金人入侵河北以後，「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金人數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⁶³欽宗曾命折彥質和孫昭遠招集宋軍進援太原的潰兵，⁶⁴可見當時不少河北地區的宋軍因兵敗而分散各地，這正好為元帥府建立軍事力量提供兵源。

⁵⁸ 《會編》，卷八五，頁六下。

⁵⁹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乙集卷三〈高宗與宗忠簡書〉，頁537。按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頁74將這一千人視為趙構的親兵。

⁶⁰ 《清波雜誌校注》，卷一〈裨將善相〉，頁2。

⁶¹ 《要錄》，卷一，頁18。

⁶² 同上注，頁20。

⁶³ 《會編》，卷五七，頁五下。

⁶⁴ 《宋史》，卷四五三〈孫昭遠傳〉，頁13318。

以上所述，是元帥府加強武力的首個階段，亦是其首個軍事系統，主要負責保護趙構，其成分包括地方民兵、⁶⁵勤王軍及本屬正規軍的潰兵，元帥府加以改編為五軍：以陳淬為都統制五軍兵馬、⁶⁶趙俊等為中軍統制、劉浩為前軍統制、張瓊為左軍統制、尚功緒為右軍統制、王孝忠為後軍統制。⁶⁷

表二：元帥府直轄五軍序列

都提舉五軍—都統制 ⁷⁰ (劉光世) (陳淬→楊惟忠)	先鋒統制 ⁶⁸ (劉浩→楊青→辛彥宗→丁順)	先鋒副統制 (丁順)
	前軍統制 (祁超)	前軍副統制 (王澈)
	後軍統制 ⁶⁹ (張俊→范實)	後軍副統制 (張換)
	左軍統制 (張瓊)	左軍副統制 (孔彥威)
	右軍統制 ⁷¹ (尚功緒→苗傅)	右軍副統制 ⁷² (劉浩)
	中軍統制 ⁷³ (張俊)	中軍副統制 ⁷⁴ (劉浩)

⁶⁵ 《要錄》卷十五云：「州有禁兵、有民兵。」(頁307)

⁶⁶ 《宋史》陳淬本傳載其曾鎮守西邊與西夏交戰，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後調守北邊，為真定府路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曾與入侵的金兵大戰。傳中又記載，「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可見此人就是元帥府都統制五軍兵馬陳淬。見《宋史》，卷四五二〈陳淬傳〉，頁13295。這樣的話，他必定帶着河北兵投效元帥府，甚至是上文提到的因真定府失陷的部份潰兵。

⁶⁷ 《會編》，卷七一，頁六下至七上。趙構即位前夕，負責護衛其至應天府的五軍統兵官如下：楊惟忠為都統制；辛彥宗為先鋒統制、丁順為先鋒副統制；祁超為前軍統制、王澈為前軍副統制；張瓊為左軍統制、孔彥威為左軍副統制；張俊為中軍統制、劉浩為中軍副統制；范實為後軍統制、張換為後軍副統制。參見《會編》，卷九四，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⁶⁸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元帥府先鋒統制劉浩改隸副元帥宗澤麾下擔任前軍統領；二十九日，改以楊青為先鋒統制；二年正月十八日，改以辛彥宗任先鋒統制。據《要錄》記載，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先鋒統制丁順為滄州兵馬鈐轄」，可知丁順後來接替辛彥宗〔下轉頁71〕

以劉浩的前軍為例，從相州移駐大名府期間，先遣丁順領軍五百前進，自己則領二千人自瀋州渡河。⁷⁵可見當時每軍只有二千多人。元帥府移駐大名府後，汪伯彥分析敵我形勢之時，曾指出：「敵兵十萬，吾軍才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⁷⁶說明當時元帥府的軍力仍局限於一萬多人，跟剛開府時沒有太大的差別。

除了招撫河北、山東一帶潰兵外，趙構亦以大元帥的名義傳檄擁有勤王軍的河北守臣，命令他們前往大名府會合。後來，部份陝西部隊也收編入元帥府，元帥府遂得以吸納其他武裝力量，包括：

(一) 知相州兼主管真定府路(宋屬河北西路)安撫使汪伯彥轄下軍馬三千人。⁷⁷

(二) 招安相州(宋屬河北西路)林慮縣天平山軍賊楊青、常景共一萬二千人(這支部隊後歸孔彥舟管轄)。⁷⁸

〔上接頁70〕

任先鋒統制。參見《要錄》，卷五，頁120；《會編》，卷七三，頁六上、九上；卷七六，頁十三上。

⁶⁹ 據《宋史》記載，「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俊勒兵從信德府守臣梁揚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梁揚祖一行於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抵達大名府與趙構會合，則張俊後軍統制的任命當在其時。參見《宋史》，卷三六九〈張俊傳〉，頁11469-70；《會編》，卷七二，頁十三上至十三下。

⁷⁰ 陳淬被命戍守澶淵，元帥府於靖康二年正月十八日改以楊惟忠為都統制。參見《要錄》，卷一，頁32；《會編》，卷七六，頁十三上。

⁷¹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尚功緒從元帥府右軍統制，改隸副元帥宗澤麾下擔任左軍統領。苗傅應該是這時候接任右軍統制的空缺。參見《要錄》，卷三，頁70；《會編》，卷七三，頁六上。

⁷² 據《要錄》記載，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右軍副統制劉浩為大明府兵馬鈐轄」（「大明府」恐為「大名府」之誤），可見劉浩從先鋒統制轉任副元帥前軍統領，後來調回元帥府任右軍副統制。參見《要錄》，卷五，頁121。

⁷³ 張俊早在靖康二年正月已擔任中軍統制。參見《要錄》，卷一，頁34；《會編》，卷九四，頁十二下。

⁷⁴ 劉浩從先鋒統制轉任副元帥前軍統領，後來調回元帥府任中軍副統制。參見《會編》，卷九五，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⁷⁵ 《會編》，卷七二，頁九下。

⁷⁶ 《中興小紀》，卷一，頁3。

⁷⁷ 趙構自磁州前往相州時，汪伯彥即遣武翼大夫劉浩領軍二千人護送入城，汪伯彥亦領親兵一千人於安陽迎接，保守估計汪伯彥麾下軍馬至少有三千人。

⁷⁸ 《會編》，卷七一，頁十一上至十一下。不少學者將孔彥舟視為盜賊，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頁68；王世宗：《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頁18。但據《金史》本傳所載，他在靖康（1126-1127）初年曾應募從軍，累官至京東西路兵馬鈐轄，故《中興小紀》稱之為「中州潰兵」。參見《中興小紀》，卷八，頁94。孔彥舟應係屬於軍賊的叛亂勢力。

(三)大名府路(宋屬河北東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大名府路兵馬都監王彥共五千人。⁷⁹

(四)知信德府(宋屬河北西路)梁揚祖領軍一萬人至大名府投效元帥府，屬下偏裨武義大夫張俊，武翼郎苗傅、范實，楊沂中，田師中，武功郎祁超及從義郎蓋淵皆在麾下。⁸⁰

(五)知磁州(宋屬河北西路)宗澤領軍二千人至大名府投效元帥府。⁸¹

(六)知洺州(宋屬河北西路)王麟領軍一千人至大名府投效元帥府，隸屬宗澤麾下。⁸²

(七)知博州(宋屬河北東路)孫振領軍二千人至冠陶縣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濮州，隸屬宗澤麾下。⁸³

(八)知深州姚鵬(宋屬河北西路)領軍二千人至館陶縣投效元帥府，隸屬宗澤麾下。⁸⁴

(九)知冀州(宋屬河北東路)權邦彥領勤王軍一千人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澶淵，隸屬宗澤麾下。⁸⁵

(十)知河間府(宋屬河北東路)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領軍二萬五千人至東平府投效元帥府，包括安撫司軍馬一萬三千人、知廣信軍(屬河北西路)張換所部

⁷⁹ 《會編》，卷七二，頁七下。

⁸⁰ 同上注，頁十三上至十三下；《要錄》，卷一，頁22。《宋史·高宗紀一》則作「三千人」(頁440)。李之亮《宋河北河東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211載錄信德府守臣至宣和六年甲辰(1124)的葉著，到第二年金人便攻陷信德府，但他並沒有續記下去；而金人攻破信德府時的守臣名楊信功，並非葉著。後來，金人執楊信功至汴京城下，宋金達成議和條件以後，宋廷立即議楊信功及通判梁訓禮之罪，結果兩人皆被貶嶺外。參見《會編》，卷二六，頁五下至六上；卷三六，頁九上。

⁸¹ 《會編》，卷七三，頁一上。據《金史》記載，淮西兵變的主角酈瓊為相州臨漳人，「崛起於兵火中，尚氣敢為，眾所推服」。參見《要錄》，卷二八，頁559。宣和年間「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為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參見《金史》，卷七九〈酈瓊傳〉，頁1781。如果酈瓊在趙構即位以前即再次投歸宗澤麾下，則宗澤投效元帥府的二千軍馬，當中的七百人是由酈瓊招集的義軍。另據汪伯彥《中興日曆》記載，當時「澤倉促收聚民兵，僅二千人，踵楊祖之後，同日而至」，則這兩千人應為民兵部隊。參見《要錄》，卷一，頁21。

⁸² 《會編》，卷七三，頁四上。據馬擴所云，曾有宣撫司屬官名王麟者，未知二人是否為同一人。參見馬擴(著)、傅朗雲(輯注)：《茅齋自敘》，收入李澍田、傅朗雲(編注)：《金史輯佚》(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16。另外，王麟以「母老無兼侍，又以疾謁告乞還守洺州」，趙構以其有異志，遂准其請，將其部下千人撥歸宗澤麾下；結果，王麟以城降於金人，為軍民所殺。參見《會編》，卷七三，頁四上。

⁸³ 《要錄》，卷三，頁73；《會編》，卷七三，頁六下。

⁸⁴ 《會編》，卷七三，頁六下；《中興小紀》，卷一，頁4。

⁸⁵ 《要錄》，卷一，頁28。

二千五百人、知保定軍(屬河北東路)高公輔所部二千五百人、知霸州(屬河北東路)辛彥宗所部五千人及知安肅軍(屬河北西路)王澈所部二千人，以高陽關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惟忠為都統制，「元帥府軍聲益振」。⁸⁶

(十一) 知濱州(宋屬河北東路)董誼領軍二千人至襲慶府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單州，聽黃潛善節制。⁸⁷

(十二) 知棣州(宋屬河北東路)趙某領軍二千人至東阿縣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單州，聽黃潛善節制。⁸⁸

(十三) 岳飛招安賊盜吉倩，得其眾三百八十人。⁸⁹

(十四) 京東路轉運判官閻邱陞領勤王軍三千人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濮州，隸屬宗澤麾下。⁹⁰

(十五) 河北軍賊高才領軍二千人歸順元帥府。⁹¹

(十六) 孟州人李興在鄉里聚兵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常元命為義軍統領。⁹²

(十七) 濮州(宋屬京東西路)民兵首領王善領軍一千人投效元帥府，命其屯駐興仁府。⁹³

(十八) 宣總司(應天府)前軍統制韓世忠領軍投效元帥府，負責護衛趙構至應天府。⁹⁴

⁸⁶ 同上注；《會編》，卷七四，頁十三上；卷七六，頁十一上。《宋史·高宗紀一》則作「數千人」(頁441)。據《林泉野記》記載，黃潛善領軍一萬投奔元帥府，可能只計算安撫司轄下的軍馬。參見《會編》，卷一二九，頁六下。又據《契丹國志》記載，宣和末奚兵進攻薊州，有名高公輔的薊州守臣棄城逃走，未知與知保定軍高公輔是否為同一人，待考。參見葉隆禮(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0。

⁸⁷ 《會編》，卷七七，頁十上。

⁸⁸ 同上注。《宗忠簡集》卷七〈遺事〉頁十四下作「知棣州趙大夫闕」，未知是指這位棣州知州是姓趙名闕，還是只有趙姓的記錄，名字卻不可考，故以「闕」字表示。

⁸⁹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芋園叢書》本，1989年)，卷二〈岳飛〉，頁二下。

⁹⁰ 《會編》，卷七八，頁二上；《中興小紀》，卷一，頁4。閻邱陞「自招民兵三千人」，則其所領軍馬也非正規部隊。參見《要錄》，卷五，頁131。

⁹¹ 《要錄》，卷三，頁70。

⁹² 《會編》，卷一二九，頁三上。

⁹³ 《要錄》，卷一，頁28、34。後來王善率眾來降，「有眾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一百一，頁2665。

⁹⁴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頁三上。但據趙雄〈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所云，韓世忠升為嘉州防禦使以後，「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趙構前往應天府之前，金軍曾圍攻應天府，幸得韓世忠領屬下的河北兵近千人保護，最終解除金人的威脅。欽宗設置四總管，以「北道總管統河北之兵」，而宣總司是由趙野、范〔下轉頁74〕

(十九) 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領鄜延兵三千人會合趙構於新興店，命其為元帥府五軍都提舉。⁹⁵

(二十) 真定府路馬步軍總管，河東、河北路宣撫司先鋒王淵以所部歸元帥府，趙構命其率所部前往保衛宗廟。⁹⁶

(二十一) 西道都總管王襄、副總管孫昭遠領所部兵與趙構會於虞城縣。⁹⁷

(二十二) 東道副總管朱勝非領軍進謁趙構於濟州。⁹⁸

(二十三)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領所部兵投效元帥府。⁹⁹

以上武裝勢力大致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為軍賊、潰兵以及盜賊，第二類為地方守臣招募得來的勤王軍、民兵隊伍，第三類為原駐守地方的正規部隊。上述部份軍事力量構成了元帥府直轄五軍以外兩個頗為關鍵的軍事系統：第一，隸屬宗澤以開德府為中心的駐軍，主要作用是「拒虜之在衛南韋城者」；第二，隸屬黃潛善以興仁府為中心的駐軍，主要作用是「拒虜之在考城者」。¹⁰⁰其下則有一些子防區，包括濮州、廣濟軍、單州及柏林鎮的駐軍，分別隸屬上述兩個主防區。至此，元帥府總算建立起一支較具規模的部隊，並憑著這批部隊，在河北、山東一帶建立起防衛據點，與金兵對峙。

元帥府移駐東平府時，已擁有超過八萬多人的部隊，即比原來在相州開府時增加了八倍軍力。他們皆沿黃河以南屯駐，¹⁰¹警備金人的進犯。筆者根據《要錄》和《會編》的記載編製成表三，以顯示元帥府駐紮東平府期間的軍隊數量及兵力配置情況：

〔上接頁73〕

訥兩支部隊組成，則韓世忠麾下當為河北兵。參見《會編》，卷五六，頁十三下。另據石文濟考證，韓世忠投效元帥府時兵力不會超過一千人。參見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頁112。

⁹⁵ 《要錄》，卷二，頁37；卷四，頁110；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頁119。劉光世麾下蕃漢弓箭手，見《要錄》，卷四，頁89。

⁹⁶ 《宋史》，卷三六九〈王淵傳〉，頁11486。

⁹⁷ 同上注，卷三五二〈王襄傳〉，頁11127；《會編》，卷九五，頁十一下。欽宗設置四都總管，以「西道總管統京西、河東之兵」，則這支部隊當有一定數量的西兵。參見《會編》，卷五六，頁十三下。

⁹⁸ 《會編》，卷九四，頁十一上至十一下。另據《翊戴記》云「大元帥進兵濟州，〔朱勝非〕即日趨竭，諸臣僚未有至者，乃首建大議」。參見《會編》，卷一百三，頁三上。欽宗設置四總管，以「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參見《會編》，卷五六，頁十三下。

⁹⁹ 《要錄》，卷四，頁97、111。何志同麾下是穎昌兵。

¹⁰⁰ 《會編》，卷八三，頁二上。關於趙構與宗澤在元帥府時期的關係，可參考王曾瑜：〈宋高宗和李綱、宗澤〉，《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年），頁73-94。

¹⁰¹ 《宋史·高宗紀一》云：「時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頁441）「百」恐為「八」之誤。

表三：元帥府兵力分佈表（東平府時期）

駐軍	統兵官	編制與軍力	資料來源
元帥府直轄五軍 (東平府駐軍)	隸屬都統制楊惟忠管轄	先鋒辛彥宗五千人，前軍祁超二千五百人，左軍張瓊二千五百人，中軍張俊二千人、趙浚二千五百人，右軍苗傅二千五百人，後軍范實二千五百人，共計一萬九千五百人	《會編》79/1下
開德府駐軍	陳淬為都統制，受副元帥宗澤節制	陳淬磁州二千人、洺州一千人，尚功緒二千人，常景二千人，王孝忠一千人，權邦彥一千人，孔彥威一萬人，共計一萬九千人	《會編》79/1下
濮州駐軍	受副元帥宗澤節制	閻邱陞三千人，姚鵬二千人，孫振二千人，共計七千人	《會編》79/1下至2上； 《要錄》2/58
興仁府駐軍	張換總制，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管轄	黃潛善一萬三千人，張換二千五百人，高公輔二千五百人，王善一萬人，共計一萬九千人	《會編》79/2下
廣濟軍駐軍	丁順總制，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管轄	丁順三千人，孟世寧二千人，溫宗建一萬人，李大鈞一萬人，張榮一萬人，共計八千人	《會編》79/2下
單州駐軍	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管轄	王澈二千人，董誼二千人，趙某二千人，共計六千人	《會編》77/10；79/2上至2下
柏林鎮駐軍	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管轄	劉浩二千人(前駐守開德府)，白安民一萬人，並計三千人	《會編》73/6；79/2下
總數	八萬一千五百人		

說明：(一) 本表所用資料包括《要錄》及《會編》；(二) 資料來源例如《會編》78/2上即表示資料出於《會編》卷七十八，頁二上。

筆者再根據《要錄》的記錄編製成表四，以顯示元帥府駐紮濟州期間，也就是趙構即位前夕的軍隊數量及兵力配置情況：

表四：元帥府兵力分佈表（濟州時期）

駐軍	統兵官	兵力數量
濟州駐軍(元帥府直轄五軍)	隸屬都統制楊惟忠節制	九千五百人
開德府駐軍	隸屬副元帥宗澤節制	一萬九千人
濮州駐軍	隸屬副元帥宗澤節制	七千人
興仁府駐軍	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節制	一萬九千人
單州駐軍	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節制	六千人

表四(續)

駐軍	統兵官	兵力數量
柏林鎮駐軍	隸屬節制軍馬黃潛善節制	三千人
總數	六萬四千五百人(另加孔彥威、常謹及丁順三盜共一萬五千人)	

說明：本表所用資料來自《要錄》卷二，頁58。

從表三及表四所反映出來的情況可見，元帥府自相州開府初期，只有約一萬人的兵力，發展到後來駐紮濟州期間的兵力已發展到八萬人之多，若再加上分佈在各地受元帥府間接控制的勤王軍，特別是屯駐在西邊的西兵，則數量當更多。這八萬大軍具有不同的來源與性質，包括有招安而來的盜賊、軍賊、潰兵，各地招集的勤王軍、民兵等，組成份子甚為複雜。因此，有學者認為「其分子頗為複雜，不易統制」。可以說，這些軍事力量即成為趙構登極之初武力的基礎。¹⁰²

六、元帥府武力的結構與特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記載：

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維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制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¹⁰³

這段簡短的記載勾畫出北宋末年，禁軍因為用人不當及外族入侵而土崩瓦解，以至趙構建立南宋政權後重建軍事力量的過程。

隨著不同來源的武裝力量被納入元帥府軍事體制內，元帥府武力在數量上確是不斷增加；但就質量而言，大部份軍馬都是臨時拼湊而成，例如前軍統制劉浩麾下的部隊屬於民兵隊伍；丁順、孔彥舟麾下的部隊則是由降盜、軍賊等組成；¹⁰⁴京東路轉運判官閻邱陞麾下的三千勤王軍，也屬於臨時徵集的民兵；¹⁰⁵宗澤在投效元帥

¹⁰² 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頁78；張峻榮：〈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頁70。

¹⁰³ 《要錄》，卷五，頁123-24。

¹⁰⁴ 同上注，頁121。

¹⁰⁵ 同上注，頁131。據南宋初年兵部尚書盧益解釋：「近制以田括丁，號為民兵，亦古鄉兵之意。」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北平圖書館影印本，1957年），兵一之十五，頁6761。

府前，曾在河北一帶招募義軍，其中包括一些招安而來的強盜，¹⁰⁶所以後來宗澤麾下併入元帥府的軍馬，其成份也十分混雜。元帥府幕僚便十分明了自身軍事力量的弱點，例如汪伯彥反駁宗澤元帥府移駐開德府的建議時指出，「五軍保衛大王外，續收方一萬三千人，其間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徑要解圍？事須量力」。¹⁰⁷元帥府軍事力量的性質，於此可見一斑。

當元帥府決定派遣宗澤進屯開德府，便以先鋒、右及後三軍共五千人，常景二千人，知洺州王麟一千人隸屬宗澤。後來再加上孔彥舟所部萬人。¹⁰⁸因此，元帥府的部隊可以說是一支「雜牌軍」。既有正規部隊，即原來駐守地方的部隊及各地因應金兵入侵而組成的勤王軍及民兵隊伍，又有招安而來的軍賊和盜匪、潰兵，¹⁰⁹所以李心傳才有「上〔趙構〕在元帥府，始招潰卒、群盜以為五軍」的結論。¹¹⁰

《宋史》有「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的說法，¹¹¹可見南宋初年仍然沿襲元帥府招寇盜為兵的軍事傳統，以補充三衙缺額。建炎（1127–1130）初年，民間流行「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之類的順口溜，諷刺當時宋廷招盜為兵的做法。¹¹²

軍事力量來源龐雜，令趙構想要控制部隊感到困難重重，而部隊作亂、叛亡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早在趙構出使河北期間，其屬下的軍官劉浩、吳湛便發生私鬥，幸得隨行的韓公裔勸解，才沒有將事情鬧大。¹¹³後來，河北軍賊高才以二千人歸順元帥府，竟語出不遜，結果為趙構所誅殺，並以右軍統制苗傅代領其軍，但苗傅竟

¹⁰⁶ 《宗忠簡集》，卷七〈遺事〉，頁八上。

¹⁰⁷ 《會編》，卷七三，頁八下。

¹⁰⁸ 《要錄》，卷一，頁22。

¹⁰⁹ 趙儷生解釋軍賊的「含義不外二端：其一，自官軍中叛出，不抗擊金人，而專肆殘害百姓、對抗官府者；其二，自農民或流民起義出身，帶有一定的人民性質，但不專力抗擊金人，到處流徙，也殘害百姓，也對抗官府，甚至有的還不惜投敵者」。見趙儷生：〈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載《趙儷生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頁315。

¹¹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御前諸軍〉，頁403。

¹¹¹ 《宋史》，卷三八一〈程瑀傳〉，頁11743。

¹¹²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中，頁67。

¹¹³ 《宋史》，卷三七九〈韓公裔傳〉，頁11703。這裏的劉浩是否即在上文提及的汪伯彥屬下的裨將武翼大夫劉浩，有待考證。但按《會編》所載，當初趙構奉使至磁州之後，知相州汪伯彥致書趙構請其回相州，曾「差武翼大夫劉浩領兵二千人馳騎請王」，則劉浩應為汪伯彥屬下的裨將。參見《會編》，卷六四，頁十上。這名劉浩與在相州招募義士的劉浩應為同一人。另外，金軍第一次圍城退兵以後，欽宗曾派遣范瓊駐軍河北「招群盜劉浩等，數戰，破之」，後來，范瓊更率領劉浩等招降的群盜進援太原。參見《會編》，卷一二九，頁十一上；《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96。這名劉浩與上述兩位劉浩是否有關連，也有待考證。

盡收其金帛、子女，以致趙構認定「傳賊耳，與才何異」。¹¹⁴在趙構看來，高才與苗傅並無區別。其他例子包括：

(一) 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行至濮州需糧，辱郡守藺中謹」，結果為濮人所殺，趙構即以其部屬常謹為統制，但常謹卻對部屬說「做官不自由、不快活，只欲落草去取快活」，企圖叛變，結果為孔彥舟所殺。最後，趙構亦只有以孔彥舟為統制軍馬，進屯澶淵，隸屬宗澤指揮。¹¹⁵

(二) 元帥府統制官劉浩派遣裨將丁順渡河，為金兵所敗，竟聚眾三千人進圍濟州。¹¹⁶

(三) 劇盜李昱以十萬眾進攻襲慶府不果，才「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南宋初年，李昱再次作亂於河北，都巡檢使劉光世派遣部將喬仲福出兵討伐。¹¹⁷

雖然元帥府曾以監軍的形式企圖控制屬下部隊，例如以閣門祇候侯章「監丁順軍」，¹¹⁸但成效大有疑問。因此，南宋建立後，趙構立刻解散此等烏合之眾，「命劉浩、丁順、孔彥威、王善各以所部人分為三等，軍人為一等，百姓強壯無業可歸願充軍者為一等，老小怯弱不堪出戰人為一等，仰各具見在人數將上，二等撥入五軍收管，第三等給公據放令逐人歸業」。¹¹⁹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不少勤王軍等武裝力量變成叛亂集團，成為南宋初年極為嚴重的內患，例如相州林慮人孔彥舟，靖康初年應募從軍，累官至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則他屬於軍賊一類的武裝勢力，大概於靖康二年(1127)二月歸附元帥府，¹²⁰為元帥府收編的軍賊常謹麾下的提轄衙兵，後斬殺陰有異志的常謹，元帥府遂以其統領常謹轄下的一萬軍馬；趙構即位後為東平府兵馬鈐轄，但不久即作亂於河北，時叛時降，最後投靠劉豫及金人。¹²¹丁順在趙構即位後為滄州兵馬鈐轄，不久也作亂於河北。¹²²王善以三千濮州民兵投效元帥府，趙構即位後授雷澤尉，不久也作亂於河北，並成為「擁眾七十萬、車萬乘」的「河東巨寇」，¹²³最後跟孔彥舟一樣走上投靠金人之路。由此可見，元帥府

¹¹⁴ 《要錄》，卷三，頁70。

¹¹⁵ 同上注，卷一，頁24；《會編》，卷八一，頁三上至三下。

¹¹⁶ 《要錄》，卷一，頁34。

¹¹⁷ 《宋史》，卷四四八〈呂由誠傳〉，頁13204；《要錄》，卷七，頁173。

¹¹⁸ 《要錄》，卷三，頁84。

¹¹⁹ 《會編》，卷一百二，頁八上至八下。

¹²⁰ 據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一書說，孔彥舟於「建炎元年正月，投奔時在東平府的元帥府，被趙構擢為宣贊舍人、統制軍馬，受宗澤節制，後又出任東平府兵馬鈐轄」(頁76)。

¹²¹ 《金史》，卷七九〈孔彥舟傳〉，頁1784；《要錄》，卷五，頁121；《會編》，卷八一，頁三下至四上。另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頁68。

¹²² 《要錄》，卷五，頁121。

¹²³ 同上注；《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澤傳〉，頁11279。但據《宋史·陳淬傳》，有「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眾十萬，長驅兩河」(頁13295)，未知是否為同一人，待考。

收編的這類屬於軍賊、潰兵、盜匪的武裝力量並不可靠。

趙構即位後，面對這些叛復無常的武裝力量，也只能安撫而不可以大加伐撻，例如孔彥舟的部下於湖南公然擾亂社會治安，趙構也只能安撫他：「汝頃事朕藩邸，具知忠勤從軍，累年頗著勞績，比聞提兵遽入湖南，公肆侵擾，遠近驚疑，以謂汝有攀附之恩，亦復如此。」並為他開脫云：「因軍兵闕糧，非汝本意。」¹²⁴可見趙構要非常小心處理此等不聽號令的部隊。

以上所舉例子多為招安而來的軍賊、盜匪，紀律敗壞是意料中事。可是，地方官員手下的勤王軍、民兵、義軍同樣軍紀不濟，例如知博州孫振以二千兵馬投效元帥府，受副元帥宗澤節制；但當宗澤與金兵激戰之時，孫振的「親兵皆懼，且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實，散而北歸」；¹²⁵京東路轉運判官閻邱陞也不聽宗澤的命令，竟敢「逗遛不前」。¹²⁶同時，宗澤曾約同屯駐濮州的知深州姚鵬一同進兵，但姚鵬卻沒有依期出兵支援。結果，宗澤只得率領部下獨力出戰。¹²⁷

由於吸收各種不同性質的武裝勢力，趙構從最初只擁有一萬人的部隊，發展到即位前夕擁有多達八萬人的部隊。這種增長在數量上是驚人的，可是仔細檢視其軍事力量的成分時，卻發現其兵源包括有軍賊、寇盜、勤王軍、民兵隊伍、潰兵以至地方上的原駐軍等，造成了元帥府武力兵源混雜的特點。

七、結論

王夫之指出：「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群盜之降者也。」¹²⁸王世宗也認為：「高宗實行招盜為軍的政策，終於使南宋初年重建後的軍力成為以盜寇兵源為主體的部隊。」¹²⁹可見高宗初年的軍隊大部份來源於招安和收編寇盜。然而，鮮有學者探討高宗初年兵源之所以龐雜的背景。可以說：這種軍隊兵源構成的特質，實肇始於趙構任大元帥時因應戰爭所造成的客觀環境而形成的建軍政策，準確一點來說，高宗吸收了元帥府時代的建軍經驗。這是元帥府與高宗初年武力重建之間重要的承傳關係。

¹²⁴ 張守：《毘陵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卷一〈賜孔彥舟詔〉，頁十七下。

¹²⁵ 《要錄》，卷三，頁73。

¹²⁶ 《宗忠簡集》，卷七〈遺事〉，頁二二上。閻邱陞在趙構即位不久，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未明言其所犯何事，李心傳也無法確知其被貶原因，但從其制文云「朝廷所持者紀綱，倘於擾攘宗定之間，即為專輒自便之計」來看，可能與他這次「逗遛不前」有關。參見《要錄》，卷五，頁131；《會編》，卷一百四，頁一上。

¹²⁷ 《要錄》，卷三，頁72。

¹²⁸ 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十〈高宗〉，頁181。

¹²⁹ 王世宗：《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頁162。

王夫之《宋論》又提出：「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¹³⁰ 劉子健認為：「在他〔高宗〕地位沒穩固的時候，就有過苗劉兩將的兵變，他被迫宣布退位。這種經驗，早就讓他對武將猜懼。」¹³¹ 徐秉愉又認為：「日後高宗和其臣僚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上，採取了收大將兵權，積極與金謀和等措施，和此次事變〔苗劉兵變〕的經驗應該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¹³² 認為苗劉兵變，「可以視為南宋初年削奪武將兵權的先聲」。¹³³ 可見建炎年間的苗劉兵變促成了趙構戒懼武人的心態，以至收兵權政策的制定。然而，很少學者探討趙構戒懼武人心態形成的背景。早在元帥府時代，趙構就已經深深體會到國家處於戰爭狀態下，一方面要依賴武人保衛政權，同時也要防止武人跋扈難制，所以他根本不用等到苗劉兵變發生，就已經對武人的跋扈難制，及其對皇權的威脅有著深刻體會。

總括而言，元帥府從成立到裁撤只經歷了短短的幾個月，卻是兩宋經歷戰爭後過渡的關鍵時刻。趙構即位以後所建構軍事力量的特質，以至對待武人的態度，或許是吸取了元帥府時代的經驗。可見研究高宗初年武力重建的問題時，元帥府的經驗實在不容忽視。

¹³⁰ 《宋論》，卷十〈高宗〉，頁 192。

¹³¹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頁 36。

¹³² 徐秉愉：〈由苗劉之變看南宋初期的君權〉，《食貨月刊》復刊第 16 卷第 11、12 期（1988 年 3 月），頁 26。

¹³³ 虞雲國：〈苗劉之變的再評價〉，載何忠禮（主編）：《南宋史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19。

Re-establishing the Military Power: A Study of the Office of Grand Marshal of Hebei

(Abstract)

Leung Wai Kei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ong Gaozong (r. 1127–1162) was confronted with a great many challenges that required him to assemble adequate military forces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Many scholars consider the practic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be essential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tradi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have, however,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role that the Office of Grand Marshal of Hebei played in the military manoeuvr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rand Marshal Office and examines, in five parts, the efforts that the southern government took to re-establish its military power. The first part surveys the history of differe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and Marshal Office in Hebei; the third part traces the whereabouts of the emperor in Hebei in this period; the fourth part describe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Office was formed; and the fifth part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Office, with information that brings u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litary campaigns that Gaozong launched during his reign.

關鍵詞：康王 軍政機構 國家建構 河北兵馬大元帥府

Keywords: Prince Kang,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tate-building, Office of Grand Marshal of Hebei